

屈
原
和
楚
辭



屈原和楚辭



古典文学基本知識丛书

中華書局

古典文学基本知識丛书

屈原和楚辞

郭加林著

中華書局

屈原和楚辭

郭加林著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部編輯

(上海新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華新日曆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787×1092 1/32·2 5/16 印張·44,000字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5,200 定價：(7)0.22元

統一書號：10018.150 59.2.滬型

目 次

一、导言	1
二、楚辞	6
(一)什么是楚辞	6
(二)楚辞产生的时代	8
(三)楚辞与南方文化	10
(四)楚辞与北方文化	14
三、屈原的生平	18
四、屈原的作品	28
(一)离骚	30
(二)九歌	41
(三)天问	50
(四)九章	53
(五)招魂	63
五、结语——屈原与我们	66

一、导言

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屈原和他的作品《楚辞》。

屈原是二千多年以前，我国南方的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生活在战国末期，那时许多诸侯国家，由于长期兼并战争的结果，逐渐集中为七个强国，而历史的发展更要求全中国的统一。怎样统一和由谁来统一，便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主题。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终于由秦始皇灭掉了六国，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全中国的统一推进了社会发展，是有着很大的进步意义的。

屈原生活的年代，正是为着实现统一，兼并斗争最激烈的时代，是七国最后决战的阶段，不论是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都进行着复杂尖锐的斗争。“纵横之士”到处游说，诸子百家展开了热烈的争鸣。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屈原，他的主张是怎样的呢？简单的讲，他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为争取中国统一而斗争的一个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因此他希望由楚国来完成统一的事业。为了抵抗秦国的兼并，他主张联合山东六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主张改革楚国的内政。他为了祖国的利益，同腐朽的贵族坚决斗争，他提出举贤授能的政治纲领，向楚国的统治者大声疾呼：“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

服。”他所指出的改革內政的道路是唯一的可以使楚国富强的道路。因为只有內政改革了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民德”。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富强，才能完成统一的事业。可是当时楚国在腐朽的贵族統治下非常黑暗，苏秦曾形容这种黑暗的情形說：“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賢以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于民。”又說：“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謁者难得見如鬼，王难得見如天帝。”（并見《战国策》《楚策》）在这种情况下，屈原任何改革的措施都不能施行，只好看着楚国一天天的衰頹下去。

另一方面由于屈原出身贵族，阶级限制了他，不能同广大人民相結合。他将变革社会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当楚王使他完全失望了之后，他感到进退維谷，感到孤立，他的精神陷在矛盾痛苦之中，他渴望找到新的出路，但那是很不明晰的。因此他虽然暴露了斥責了那一般腐朽的贵族們，却没有力量給他們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不能从阶级本质上来認識他們，反而以“仁义”等等抽象的道德观念去要求他們，这种見解是十分保守的。我們应当承認这种阶级的局限性，也是屈原政治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虽然屈原在政治斗争上遭遇到失败，他却沒有去低徊咏叹自己不幸的命运——象后来許多文人那样。他写作了許多詩篇，噴发出控訴的火焰，憤怒的呼吁自己的不平。他坚信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楚王和楚国的利益，他坚信正义是在自己这一边的，因此至死也不能改变。他毫不留情的揭露了他的政敌們自私自利的卑鄙行为，并进而暴露了整个社会的

顛倒錯亂，黑暗腐朽。他的詩便是他鬥爭的武器，是在公正的人民的面前提出的証詞，証明了那個社會的不合理，証明了那個社會對於正直忠貞的有才能的個性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正因為屈原的詩作不是逃避鬥爭的個人的感傷，他的人格才是光輝的，才值得我們同情、崇敬。他同楚國一般貴族是堅決對立的，因此我們可以承認他是一個貴族階級的叛逆者。

屈原政治上的失敗，却換得了文學上的輝煌成就，他將自己思想的精華，在詩篇中傾吐了出來。在他的詩篇中，表現了深厚的愛國熱情，他說：“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那里是我自身害怕災禍啊，怕的是國君的車子要翻覆。）“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不堪設想大廈會變成荒冢，難道兩座東門也會荒蕪？）“惟郢路之辽遠兮，魂一夕而九逝。”（郢都的路途遙遠，一夜間魂歸九暉。）在詩篇中，他表示了對人民的無限同情：“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鑷。”（想跳起身來四面亂闖啊，看到人民的災難又鑷定下來。）詩篇中又描寫了十分真摯的愛情，如《山鬼》、《湘君》、《湘夫人》；純潔堅貞的性格，如《橘頌》；勇武悲壯的氣概，如《國殤》。通過詩篇，作者也傳達了自己豐富的知識，在《天問》中，一切自然現象，歷史傳說，都是作者所關心的，都是作者思考着的。屈原的詩篇正是以這種豐富的內容，積極的精神，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就。

屈原的詩篇是深深地激動人心的，他的詩是生命的結晶，是鬥爭生活的再現。所以在他的詩篇中，分明的愛憎，希望與

失望，忧愁痛苦的情绪，不屈服不妥协的性格，都得到真实地具体地表现。他的诗没有一点矯揉造作，所以就具有民間文学朴素健康的气质。而且詩人更有意識的学习了民間文学，他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創造了《楚辞》这种艺术形式的。屈原这种坚决的革新文化的举动，更足以說明他思想的民主性；因为要抛弃貴族文学的傳統的“典雅”作风而去学习民間創作，这一方面要对民間文学有深厚的热爱，一方面还要有勇敢的斗争精神，才能毫无顧虑的打碎旧傳統的种种束縛。

詩人的生活和他的詩篇是相互說明的，詩人以他斗争的一生和他的詩篇教育着后代的人們，他的影响是深远的：民間长期的流傳着他的故事，象《楚胜蹟志》記載：“归州三閩乡有玉米田，相傳屈原耕此，产玉米，似玉。三閩乡一名归乡。”这显然是因为屈原志行芳洁；《离骚》中又有“精琼糈以为粮”的話，才附会出这样的故事。这可以說明屈原留在人民心上的是怎样光輝的形象。人們不仅傳說着屈原的故事，并且永远紀念这位同情人民坚持正义的詩人，据說端午节就是紀念屈原自投汨罗江的节日。这一天很多地方都有吃粽子和划龙船的风俗，划龙船是为了打撈屈原的屍首，縛粽子则是为了防止蛟龙夺食投祭屈原的食品。此外有关紀念和咏叹屈原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无代无之，同样表现了人們对屈原的热爱。正如李白的詩句“屈平詞賦悬日月”，屈原的名字将象日月一样永远存在。

不仅中国人民普遍的紀念屈原，在今天，当全世界人民在

保卫和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向战争挑撥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历史上每一位偉大的詩人、科学家、思想家——那曾經将毕生精力献給人类的和平幸福的优秀的人們，对于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引导全世界人民共同前进便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屈原正是这样一位詩人，所以 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全世界紀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的名字。

我們祖国产生了这样一位杰出的詩人，对于全世界全人类都是一个偉大的貢獻，我們要永远紀念并学习这位偉大的詩人。

二、楚 辞

(一)什么是楚辞

大約从汉代初年“楚辞”的名称便已建立，《汉书》《朱买臣傳》：“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辞》，帝甚悅之。”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可見武帝时“楚辞”已成了一种專門的學問，与《春秋》相提並論了。到了西汉末年刘向編定《楚辞》集，确定了《楚辞》所包含的篇章，此后的研究者便以此为根据，說到“楚辞”便专指这部书中所刊载的作品。

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人們提到“楚辞”时，总是指着屈原的作品，因为他是《楚辞》的開創者，《楚辞》的最主要的作家。其他如宋玉、景差、庄忌等人的作品，在形式上固然都是模仿屈原，在內容上也都是悼念屈原或者学着屈原抒写其忧愁怀抱的，他們的成就却远不及屈原，作品也較屈原为少，因此用屈原的作品代表《楚辞》全体，是完全可以的。

“楚辞”两个字應該如何解釋呢？《史記》《屈賈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賦見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終莫敢直諫。”这段話說明了辞便是“辞令”“言辞”的意思，並無深义可尋的。而作为一种文体所以称作“楚辞”者，最主要的便因为它是楚声的文学，是充

分的表现了楚民族的特点的文学。宋黄伯思说：“屈原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薛、蹇、纷、侘僚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蕙、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解释“楚辞”的名称，从形式方面看，大抵是恰当的。他所举的这些特点最主要的便是声音的特点，照我们今天各地方言还如此相异的情况推测，当时南方语言定有其显著的特色，可惜，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楚辞》中某些特殊的辞彙，而语音则无从知晓了。

明白了《楚辞》是中国最早的方言文学，明白了汉人因此而定出“楚辞”的名称，我们便可以将《楚辞》与“汉赋”区别开来。“汉赋”是没有地方特色的，而其典型的作风，是“铺采摛文”，堆砌了各种典雅的华丽的辞藻，结果弄得“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成了内容空洞缺少生气的东西。这与运用方言口语，表现真实情感的《楚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汉赋”，严格说来祇是诗化的散文，而《楚辞》却是真正的诗歌。

屈原的代表作品是《离骚》，所以后来人们又好以“骚”或“楚骚”来代表《楚辞》的名称。这是不恰当的，因为《离骚》有其特定的含义，并非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

总之，“楚辞”便是用楚国方言写成的诗歌，是楚声的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地方色彩。只有作这样的理解，才更突出屈原在《楚辞》中的地位——《楚辞》本应祇包括战国时代楚国作家的一些作品。

(二) 楚辞产生的时代

《楚辞》产生的时代是在战国(前 403—前 221)末年,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 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 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就促使从春秋以来酝酿着的社会变革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阶级斗争迫使许多诸侯国家或先或后的进行了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 与此相应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时候, 土地所有制由世袭的不得自由买卖的贵族领主所有制, 改变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所有制, 实物地租初步地代替了劳役地租。新的经济制度更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加强了各国的经济联系, 一些贵族领主的城堡开始转变为新兴的商业都市。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动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 在多数国家内部便是政权的下移, 废除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由贵族卿、大夫转变成的新兴的地主实际掌握了政权; 而在各国之间便是通过频繁的兼并战争, 最后完成全中国的统一。

经过长期的战争, 春秋以来许多小国都被消灭, 形成了七个强国——齐、楚、燕、赵、韩、魏、秦并立的局势。

七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战国初期, 韩、赵、魏曾经是强国, 可是后来便衰弱了, 齐国则由于历史悠久, 文化较高, 是东方的大国。秦国本来是兴起较晚的, 可是由于在秦孝公时代(前 361—前 338)实行了商鞅的比較彻底的变法之后, 日益发展为最强大的国家。而楚国, 一直是南方的霸主, 国力很雄

厚，它的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到了战国时代，经济、文化都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从《楚辞》所描写与近代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物相印证，便可以看出楚国与各国贸易频繁，经济发达的情形。但是楚国的社会制度却是比较落后的。它的政治权力一直操纵在国君和氏族贵族的手中——不象变法后的秦国和中原各国，卿、大夫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贵族领主的主要权力。不消灭这种领主贵族世袭的特权，政治就始终是腐败的。楚国在悼王时代（前401—前381）前期法家的吴起也曾实行变法，他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取消贵族的特权：凡封君的子孫已傳三世的取消爵祿；（二）將貴族遷到荒僻之處，率領奴隸墾荒（貴族人數不多，只能是率領奴隸墾荒）；（三）施行法制：“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敢苟合，行義不顧毀譽”；（四）加強國防：選練士卒，改變國都鄢郢“兩版垣”（版築）的建築方法。（略采楊寬《戰國史》）經過這樣的改革，楚国本可以更加強大起來統一中國，可惜吳起變法沒有多久，楚悼王死了，吳起被貴族領主攻殺，貴族政權復辟，變法的影響逐漸消滅，從屈原詩篇所揭露，我們可以看到楚懷王時依舊是那種貴族統治的腐敗樣子。韓非說：“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強”，正好是楚、秦歷史的總結。

战国时代，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在思想界便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气象，那个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有：孟軻、庄周、荀卿、韓非、公孙龙、惠施、鄒衍……。他们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对当时的政治、学术思想展开了热烈的争辩。比较进步的思想家，都继承了从春秋以来盛行的重民学说，主张减轻赋

稅力役。他們有的主張“舉賢任能”推行賢明的政治，有的主張採用法制打擊舊貴族，建立封建秩序。反動的思想家，則主張社會倒退，恢復領主統治，或者回復到原始社會去。在哲學思想方面則展開了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鬥爭，辯證思維與形而上學，詭辯術的鬥爭，這些鬥爭主要表現在對自然對科學不同的觀念上面。

這些政治家、思想家有許多著作留傳下來，或者談哲學，或者談歷史（也有象《左傳》、《國語》這樣專門的歷史著作），都是用很美的散文寫出來的。他們往往運用神話傳說、歷史故事，或自己編造的故事來說明道理，他們的文章都是較多的運用當時的口語，採用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以達到其宣傳的效果。

這種文化高漲的現象，正是經濟政治變革的結果，因為經濟政治變革了，才使一向掌握在統治者手中的“官學”轉移到下層來，代表了各階層利益的各种“私學”學派的興起，正反映了當時經濟、政治方面的激烈鬥爭，反映了政治權力的下移。“楚辭”產生在這個時代，正說明了由於屈原的思想進步，與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一般變革相適應，在詩歌的領域內也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變革。

（三）楚辭與南方文化

楚國的祖先據《史記》說是黃帝的孫子顓頊高陽，《離騷》中也承認是“帝高陽之苗裔”。其實這是不可靠的，這是戰國時代為了消滅各族的歷史隔閡促進統一，在學術界思想界流

行的三代(夏、商、周)同源的說法。楚国真正的祖先大約是被夏禹壓迫到江漢流域的苗族。周代初年江漢流域遍布着許多小國，華夏族稱之為蠻夷。後來楚国逐漸強大，統一了南方諸國(包括一部分姬姓國在內)，勢力與中原各國相等。但是仍然沒有擺脫蠻夷的稱號。直到戰國時代，經過長期的鬥爭與融合，各族間的基本差別已經消失，一個經濟文化高度發展的漢民族開始形成，這時候，楚国蠻族的帽子才完全摘掉了。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南方文化卻保留了某些自己的特色。

南方的語言與中原有較大的差異，孟子說：“南蠻鴟舌之人”。(《滕文公上》)便指明了南方人語音特別。在《說苑》《善說篇》中保存了一首《越人歌》：“濫兮杼草濫予昌州州儺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諭滲提隨河湖。”既無法斷句，也不懂這些語音的意思，和中原的語言完全不同。楚人的語言，與中原也有差別，《左傳》有一條記載：“楚人謂乳穀；謂虎于菟；故命之曰：門穀于菟”。南北方言一直存在着較大的隔閡，是有歷史原因的。《楚辭》中大量運用了楚国方言，就是這種地方的特色的表現。

由於各族風習不同，南方的服飾也不同于中原，莊子曾講過宋人販章甫之冠往越國，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的故事。楚人的服制也與中原有別，《史記》《叔孫通傳》說：“叔孫通儒服，漢王(劉邦)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又《呂不韋傳》說：“呂不韋以秦異人說于秦，及異人至秦，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悅)其狀，曰：‘吾楚人也，而(尔)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離騷》中“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正描写了楚国的服飾。

南方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所表现的宗教观念，和巫术迷信的风俗。春秋以来，由于社会进步的结果，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始迷信，对于鬼神大抵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并且以为“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左傳》僖公十九年傳）是将鬼神看作抽象的存在，摒除了幻想的拜物教的性质。可是，南方由于较长时期处在落后的状态，仍保存着对鬼神的原始信仰，将鬼神当作真实的存在，并且人们可以通过巫和他们交往，因此便盛行了巫风淫祀。由于对鬼神虔诚的信仰就可能保存下大量的神话；由于巫风的盛行，也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而神话同乐舞便是产生《楚辞》的艺术土壤。

下面我们就从绘画、雕刻、音乐三个方面，来看看这种巫术文化的影响。

据王逸《天問》注說，楚国宗庙神祠中有大壁画：“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瑋璋僑僂，及古賢圣怪物行事。”楚国的壁画，今天还没有发现，按理大概是会有的。1949年长沙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张帛画，画面上一个女子，腰极细，装束美丽，她合掌敬礼，注视着面前的一夔一凤的斗争，夔将她唯一的一只爪伸向凤鸟的头，而凤鸟则矫捷的避开，同时一只向前曲着的脚爪，有力的向夔抓去。这图画画的是神话怪物，却有象征的意义，一足夔象征着恶，象征着死亡，而凤鸟则象征着善，象征着生命，画幅已明显的表示出凤鸟的优势，那个女子也正为生命的胜利，和平的胜利祈禱。（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这种把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艺术作品，同《楚辞》一样，都

是綜合了巫术迷信和神話的材料，加以改造加以提高的产物。

长沙楚墓还曾出土好几件木雕怪神象，一种是人首蛇身，头戴鹿角，舌伸口外，沒有手足，下承方座的；一种是身作鈎状的龙，两爪上举到額，作張口状，舌伸口外，头戴角，下体也連方座。后一种通体有黑色薄漆，龙眼黄色，眼球紅色，舌紅色，身体有紅、黃、白三色花紋，这类怪物便是《天問》、《招魂》中所描写的，也是巫术文化的表現。

南方的音乐与中原不同，屢見于文献記載。《左傳》成公九年傳：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旧也。”

什么是南音呢？《呂氏春秋》說：“楚之衰也作巫音。”（《修樂篇》）可見巫音至少是南音的一種特色。《招魂》的音乐我們已不可知，但看它每句下都有一个“些”字，正是巫音的一種表現。

在《楚辭》之前，南方也有民歌流傳，如前所舉越人歌，曾經過楚人的翻譯，它的歌辭是：

今夕何夕兮，牽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替詬恥。心几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悅）君兮君不知！

這首歌是前六世紀中叶產生的，稍遲又有徐人歌：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這些歌的抒情意味很濃，而且由于句子參差不齊和語詞“兮”